



漢語史研究叢書

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

周及徐◎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漢語史研究叢書

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

周及徐◎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43316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周及徐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7
(漢語史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657-0

I. 漢... II. 周... III. 比較詞彙學—漢語、印歐語系 IV. H7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8349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龍

責任編輯:彭澤學

封面設計:文小牛

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

周及徐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21.25 字數 45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5409-2657-0/H·82

定價:53.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一

Preface

For over a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noticed similarities in the sounds and meanings of words in Sinitic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A few linguists have even attempted to draw up relatively lengthy lists consisting of a hundred or two hundred apparent cognates in the two language families and account for them in terms of phonological principles. Prominent among these was Professor Tsung-tung Chang of Germany who wrote a well-known article on this subject entitled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 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Sino-Platonic Papers*, 7 (January, 1988), i, 1-56.

What is most intriguing about Professor Zhou Jixu's book, for which I have written this preface, is that it corroborates Professor Chang's work so well. Even more striking is the fact that Professor Zhou arrived at his conclusions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of Professor Chang, whose article he had not seen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own researches. Although Professor Chang continued to work on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itic and Indo-European after he published his famous article in *Sino-Platonic Papers* and

intended to present a dictionary of 1,500 shared etymons, his unfortunate demise a couple of years ago brought an end to his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Professor Chang was carrying out his research in Germany, however, Professor Zhou (then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Sichuan University), was engaged in writing this dissertation in Chengdu. It is evident that Professor Zhou has gone beyond what Professor Chang had accomplished, both in terms of sheer numbers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Indo-European and Sinitic and with regard to his efforts to account for these similarities in a systematic fashion. Professor Zhou has admirably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onsistent, historically-grounded phono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 families, which makes his comparisons more believable than if he had merely drawn up a list of look-alikes in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and contemporary Indo-European daughter languages.

Professor Zhou's work is compatible with recent discoverie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archaeology, genetics, ancient textile research, metallurgy, and other fields. Clearly, the Bronze Age ancestors of China were not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were exchanging elements of culture with peoples in many directions. As we can observe so abundantly in historic times, when people share culture, they inevitably also share language,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y behaved any differently in prehistoric times. Professor Zhou's discoveri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rve to

underscore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uman ecumene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civilization.

It is my pleasure to write this brief preface for Professor Zhou Jixu's book on Sinitic and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comparisons. I hope that his findings will have the impact they deserve,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the West.

Professor Victor H. Mai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譯文：

一百多年來，有許多學者注意到漢語和印歐語之間的詞彙音、義相似的現象，少數語言學家甚至一直試圖列出包含一二百詞的比較長的詞表，以展示兩種語言中看似同源的詞，並試圖根據音位學原理加以說明。德國學者張聰東教授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古代漢語中的印歐語詞彙：關於漢語的出現和新石器時代晚期文明的新命題”。（*Sino-Platonic Papers*, 7(January, 1988), I, 1-56.）

周及徐教授^①的這本書（為此書我寫了這篇序）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是，它竟這樣好地證實了張教授的研究。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周的研究過程中，沒有見到張的這篇文章，周是在不知到張的研究的情況下，完全獨立地得出自己的結論的。張聰東教授在發

① 周及徐是中國四川師範大學副教授，梅維恒先生用了泛稱。特此說明。——譯者

表了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後，就漢語和印歐語之間的關係問題繼續工作，並打算寫成一個包含 1,500 詞的共有的同源詞詞典。可是不幸於兩年前去世，從而中止了他的研究。

在張教授於德國進行他的研究的同時，周及徐教授（當時是四川大學的博士生）正在成都埋頭撰寫學位論文。很顯然，無論是從印歐語和漢語之間相似詞彙的數量上，還是從以一個系統模式來解釋這些相似的詞彙的努力上，周教授已經超越了張教授曾經完成的工作。周教授力圖建立兩種語系之間的一致的、歷史基礎上的音位學關係，令人贊賞。比起僅僅列出現代漢語和當代印歐語子語言之間貌似詞彙的做法，周教授的方法使得他的比較結果更為令人信服。

周教授的研究結果與近年來考古學、遺傳學、古代紡織研究、古代冶金術以及其他領域的發現相一致。顯然，中國青銅時代的祖先們並未和世界其他地域的人們隔絕開來，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與世界各民族進行着文化因素的交流。我們可以充分地觀察到，有史以來，當人們共享文化的時候必然會分享語言；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在史前時期，人類各民族的行爲會互不相幹。周教授在歷史語言學上的發現足以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自人類文明萌芽之初，中國一直是人類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我很高興為周及徐教授關於漢語和印歐語語言比較的這本書寫了這個簡短的序。我希望他的發現將會引起應有的衝擊，不僅僅是在中國，而且在西方。

梅維恒

2001 年 11 月 27 日

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序 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稟賦與特長。周及徐同志的稟賦與特長，就學術研究言之，是對語音易於感知，喜歡研究語音對應、多種語言的詞彙對應等問題。在他攻博前後的幾年中，他尤關注古音構擬、歷史語言學等領域的前沿動態，着力閱讀與研討王力、高本漢、李方桂、包擬古、鄭張尚芳、邢公畹諸位先生的論著，同時系統查檢與鑽研古希臘語、拉丁語、原始日耳曼語、梵語等古印歐語詞彙的豐富材料，由此而確定了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的論文選題。古音構擬、歷史語言學的研究非我之所長，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說文》詞彙與上古漢語文獻詞彙。鑒於周及徐在漢語—印歐語詞彙的比較研究上已有多年的積累，請教過一些專家，且在該課題上多能持論有據地提出自己獨到的、創新的見解，又鑒於在上古經學文獻、諸子史傳文獻和上古漢語詞彙意義、詞彙構成的研究上我較為熟悉，可以與他開展這一課題的研究。

周及徐今已是四十餘歲的人，他的稟賦、特長，他的特殊經歷（當“知青”時經過磨難，後又學醫，還做過出版社編輯），促成他眼光較為敏銳，研究較為精細，有很好的語言文字表達的基本功，能够用規範的用語把自己作了深入理解的意思確切、明晰地表達出來，這些都是他明顯地勝過同輩中的一般人的地方。確定“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的課題，難度是很大的。因為，正如他本人也認識到的，就目前通行的看法來說，漢語和印歐語系

語言，無論從類型學上看，還是從發生學關係上看，以及從地理分布上看，都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語言。歷史文獻也沒有關於漢藏語系民族和印歐語系民族在史前時期密切接觸、交流的記載，甚至連這樣的傳說都沒有。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對漢語和印歐語作廣泛的詞彙比較和系統的語音比較，以確定兩者在史前時期是否存在某種關係。周及徐發揮其特長，憑借着自己的眼光、鑽研精神和學術積累，滿懷信心地開始了這一新的嘗試。在博士論文的撰寫和修改的過程中，他抓緊搜集、梳理與研究各種可靠的語料，隨時匯集新的成果，并向國內有關專家諮詢疑難問題，同時我們也經常交流信息，討論重點問題，隨着認識的提高而修正論文的寫作方案。我們形成這樣的共識：科學的結論是在對翔實材料的陳述中逐步顯露與確定的，漢語、印歐語的詞彙是否存在對應關係，祇有經過論證纔能明白，這種論證工作的前提，應是着手對這兩種語系的詞彙進行梳理與研討；在研討時，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為主，同時盡一切努力采用考古學、古人類學、上古史研究、古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方法與成果。探討兩種語系詞彙的對應關係，應取十分審慎的態度，在清理它們的音同或音近的關係後，對它們的義詞、義近或義通的分析與說明尤應客觀與確切，應有諸多堅確不拔的例證做支撐。對上古漢語詞彙的語音、詞義的論說，當以精審嚴栗出之，這是我們熟悉而親切的上古時代的民族語詞彙，至今貯存於悠久而浩繁的典籍中，對它們的內涵的抽繹與表述自應系統而深刻。周及徐在論文中列舉 713 個有對應關係的字詞，319 組對應的同族詞，47 個有對應關係的基本詞彙，62 組有對應關係的同音詞，以及一些構詞成分的對應，證明上古漢語和古代印歐語之間

存在着許多有對應關係的詞彙，存在着有規律的語音對應，甚至存在着相似的形態因素。他得出的結論是：漢語和印歐語這兩種傳統譜系分類分屬兩大不同語系的語言，在史前時期有過密切關係；至於這種關係是源流還是交流，則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周及徐的論文得到北京、上海一批前輩專家的關注，專家肯定論文提出的漢語和印歐語詞彙比較當以比較詞根的語音對應規律為主，是切合實際的有效方法；並認為該文對漢語和印歐語作了深入的對比研究，這對於研究史前漢語和漢語起源，對於探索遠古漢藏語系民族和印歐語系民族的關係是有創新意義的嘗試，是有學術價值的；同時專家們還就語音對應的條件、詞彙對應關係中詞彙意義的認定等提出了補充、修改的意見。有的老專家還將珍藏的材料慷慨相贈，體現了對青年學者的熱情扶持。

現在，論文作了修正與充實，即將交付出版，這應當是周及徐深入拓展這一課題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宋永培

2001年9月於四川大學

序 三

在歷史比較語言學領域，印歐諸語的比較最為成熟，漢藏諸語的比較也卓有成效。而尋求漢語與印歐語的古老聯繫，則是一個頗新穎的選題。周及徐的《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是對這一研究作出的很有意義的嘗試。本書的出版，在國內是填補了一項空白。

人類基因研究已經證明現代人類是同一起源的。這樣，理論上推導人類語言最初有共同起源也并非荒謬了。但是，那沒有什麼具體意義。語言的發生與分化是一個幾萬年漫長的歷程，面對千變萬化、面目各異的語言，分析出哪些語言是由比較接近的分支產生的，它們具體經過哪些分化或融合的形成過程，還要我們細致認真的探索。印歐語系研究的歷史最長最成功，上個世紀以來漢藏語系的漢語及其親屬語的比較也取得很大成績；但兩大語系之間有無關係，有什麼關係，以前人們一般不敢涉及，尤其在漢語與印歐語之間。因為漢語曾被視為“孤立語”的代表，與作為“屈折語”典型的印歐語之間，以前大多數學者不敢想象它們會有親密關係。語言學研究的新進展使人們認識到不同語言類型是可以轉化的，應該打破這種不必要的拘束或偏執。有少數學者曾就這方面作了試探，但都還沒來得及作真正的科學意義上的比較。國外加拿大學者蒲立本（E.G.Pulleyblank）1966 在《漢語與印歐語》（載 JRAS 9-39）中已推測了漢語跟印歐語言間有親密關係，還沒着手作真正的詞彙比較。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張聰東博士

(Chang Tsung-tung) 用 J.Pokorny 《印度日爾曼語語源詞典》(Indoger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 1959) 所擬原始印歐語詞彙形式為主跟上古漢語比較，寫了《上古漢語中的印歐詞彙》(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柏拉圖論文集[7]》，1988)，《古漢語複輔音在印歐詞彙的印證》(《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言研究》1991 增刊) 等論文，他也曾計劃編《漢—印歐詞源詞典》，惜資志以歿，未竟其功。但張氏的漢語古音構擬是從高本漢擬音和他認為的印歐關係詞之間拼湊一個原始值來的，以此來說明印歐如何過渡到漢語的，這樣就缺乏客觀標準而似隨意取巧了，像幽部的“道”和魚鐸部的“簿”韻母都作 -o:g，之部的“部”和魚部的“馬”都作 -og，因為它們對印歐 -og，另外幽部的“皓誘”作 -əug，那是對印歐的 -euk、-eug (張氏大概據高本漢把魚部擬 o 的看法纔認為幽魚兩部接近，現在古音學界早已擯弃高的陳舊看法，認定上古魚部為 a，而 a 高化為 o 是漢以下音)。他把幽部的“流”和魚部的“疏”都擬為同一原始**sreu，然後說“流”變 zleu、“疏”變 slio，以對印歐詞根 sreus。其實“疏”從“疋”(音雅)得聲，和“流”字既不同聲符，也不同韻部。這樣張氏的擬對雖然有些是有參考價值的，但對音基礎是不牢靠的，不易取信於人，需要再予科學的甄辨。河南大學外國語研究所陳衛恒等先生也在進行“跨語系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試圖求證平行發展的人類語言間的共同特徵，而不以親緣或同源關係為目的，這樣他們的印歐—漢藏語源比較在目標方法上又是另一條路。但他們舉例中，像拿漢語“筆”跟拉丁 penna、英語 pen、法語 plume 來比就似乎不妥，這些印歐語的語源都來自“羽毛”，因為印歐人有以削尖羽毛管來書寫的歷史，而漢人却没有這種歷

史習慣，漢語“筆”*prud 則來自小毛刷，而非羽毛。不能因為兩者都有 pl- 式複輔音聲母，用途相同，就認為有相通關係，這類比較仍然不應脫離語源歷史的制約。

周氏的新著採用了我們最新的上古漢語擬音系統，至少在漢語方面能避免張氏的缺陷。他依此跟印歐語作了 716 個對應關係詞的比較，319 組同族詞、與 47 個基本詞彙、62 組異源共形詞（相對應的同音詞）的比較。先依上古漢語韻部排列以示語音對應規律，又對這些關係詞依同音詞、詞綴、基本詞彙、文化詞彙等類別，分別分析其對應關係。這種做法是考慮嚴謹的，所用的比較方法也是科學的。雖然，由於是新的嘗試，並非每組的比較都能確立，有些擇對、尤其有些印歐詞根後附音節過長的詞，更還需慎重甄辨。但這些詞彙比較的提出本身，就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其中有些對應是很不錯的。例如古漢語詞對英語詞：“牛”：cow，“熊”：bear，“澤”：lake，“防”：bank，“葉”：leaf，“策”：liber，“雁”：gander，“風”（詩）：poem，“鳳”：phoenix，“卵”：rone（古），“背”：back，“吻”：mouth（古高德：mund），“芥”（𦵏）：grass，“籊”：nip，“戈”：gar，“徧”：pan-，“邇、尼”：near，“睪”：look，“奪”：loot，“舐”：lick，“微”“麼”：small，“敕”：suck，“步”：pace（古高德 pas），“縛”：pack，“焚”：burn，這些擇對都較好。歷年來我也積累了與此相關的一批卡片，有些就是相同的。

關於“鉗、蚶、厭”對 clamp、cram、clam 一組，及“脛、經、脛”對 skein、chine、shiu 一組，這類同族詞比較也相當精彩。

周氏除採用了最新的漢語古音擬音系統外，又結合與印歐語的比較在古漢語上聲韻尾構擬上提出帶濁塞音的主張，這有一定

的創見性，也發展和佐證了鄭張 1994《漢語聲調平仄之分與上聲去聲的起源》一項簡單的推測。

本書的研究的成果可以為人類史前史提供其他學科不能得到的證據，說明漢藏和印歐語言在史前可能的聯繫。雖然在元音變化上印歐語有的跟漢語不能相證，這在上古以元音作形態手段時不足為奇。藏文三時一式的元音變化可以說明元音在形態變化中可相差很大。

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新領域。國外有關論述，還沒有本書這樣大規模的比較。因此我很高興為本書寫這個簡短的序。本書的論點也許會在我國或西方語言學界引起衝擊與爭論，而這對歷史語言學的發展應該是有利的。

鄭張尚芳

2002年5月14日

自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告訴人們一個歷史事實：漢語和印歐語，當然也包括使用這些語言的民族，在史前時期曾有過密切關係。這個事實是根據歷史語言學的證據證明的。

“漢語—印歐語比較”這樣的題目原本是我這樣的青年後學不敢妄議的。因為漢語和印歐語的關係看起來實在是太遠了。從發生學關係上看，一個屬於漢藏語系，一個屬於印歐語系；從地理分布上看，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從類型學上看，19世紀以來的歷史語言學著作和教科書中，往往把印歐語作為“屈折語”的典型，把漢語作為“孤立語”的典型，仿佛它們是人類語言世界的兩極。總之，它們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語言。另外，使用這兩類語言的民族在歷史文化方面的長久的隔閡狀態也間接地支持了這種觀點。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華夏民族和印歐民族交往的歷史是紀元以後纔有的，此前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他們似乎互不相幹。

然而在20世紀的後半葉，隨着科學研究的深入，這種觀點受到了挑戰。一方面是自然科學的進展，史前考古發現中亞東部地區有印歐人活動的遺迹，一些古老的技術（如青銅冶煉術）是從舊大陸的西部傳入東部的。令人吃驚的發現來自遺傳學：現代亞洲東部居民和歐洲人一樣，是非洲先民的後裔，萬里迢迢輾轉遷

徙進入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另一方面，歷史語言學研究發現，漢語作為“孤立語”的一些特徵，例如單音節、有聲調、無形態變化、有量詞等等，在上古時期並不是漢語的特徵。越是把時間往前迴溯，“屈折語”和“孤立語”的區別就越是模糊。最重要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者在漢語上古音研究中取得長足的進步，上古漢語的語音形式顯露得更清楚。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使得我們有可能將上古漢語與其他語言進行比較。

語言之間的歷史比較，是同源語言之間的比較；而語言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不能預知於比較之前。祇有通過比較纔能確定語言之間的親疏遠近。因此，超越“語系”的語言比較是符合於歷史語言學原則的。實際上，“語系”不過是一些預先的假設，需要根據不斷進展的各語言的比較結果進行調整。當今國際語言學界提出的諾斯特拉語系（Nosratic）、歐亞大語系（Eurasianic）、漢—高加索語系（Sino-Caucasian）、南方語系（Austric）等等概念，就是根據近年來新的語言比較結果對語系做出的新劃分。最終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事先劃定的框框，而是實際的、深入細緻的事實比較。德國歷史語言學家格里木（Jakob Grimm）說過：“在我看來，觀察乃是語言研究的靈魂。觀察以其事實的確定性使一切理論受到懷疑。”這話道出了語言研究的精髓。科學不斷發展的歷史，就是懷疑“常理”、挑戰“權威”從而探求真理的歷史。

這樣，在其他學科研究的啓發下，根據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原則和基本方法，運用漢語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我將漢語和印歐語進行了比較。我從語言歷史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漢語和印歐語在史前時期曾有過密切的關係。（這個“密切關係”包括同源關係

和史前時期的密切交流兩種可能。)並由此得出推論:華夏民族和印歐民族在史前時期有過密切關係。漢語和印歐語都是歷史悠久、上古文獻資料豐富的語言,比較工作纔剛剛開始,許多頗有吸引力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這本書以我在 2001 年 3 月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除了一些細節的增刪外,沒有做大的修改。這一方面是由於出版時間倉促,不容我做太多的改動;另一方面則是:我愈加相信我原來的觀點和結論。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工作之一是歸納語言事實。本書以四分之三的篇幅提供了上古漢語與古印歐語詞彙對應的證據。讀者可根據這些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斷或做進一步的研究。本書中的錯訛之處,自知不免,敬請讀者指正。漢—印歐語比較是一個新領域、可借鑒的東西很少,加之我功底淺、悟性差,寫作時曾一度困難重重。現在這些都過去了。回首往事,我倍加感謝我的導師宋永培和其他許多前輩師長、同仁朋友給予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

美國著名漢學家梅維恒教授、永培師和鄭張尚芳先生欣然應約為本書作序,在此表示感謝。

我還要提到從事漢語史和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海內外學者們。他們在一個世紀以來的卓越的研究成果,特別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雅洪托夫、蒲立本、李方桂、包擬古、鄭張尚芳、潘悟雲等人在漢語上古音研究和漢語與其他語言歷史比較研究中的出色貢獻,為我鋪平了道路,使我得以走進漢語—印歐語比較的新領域。他們的著述在本論文中多所汲取、引用。在此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謝。

值本書出版之際,再次感謝幫助過我的老師們,他們是(按